再谈契丹大字"乣"的读音及其相关问题*

额 尔 敦 · 巴 特 尔 (中国 · 内蒙古大学)

ERDENIBAGATUR Borjigidai. (2008). A Re-examina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Khitan Large Script '乣'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Altai Hakpo* 18: 79-88. The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There exist certain records of 乣(糺) in the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which are related to some of the major events of those three dynasties. In this light, many researchers hav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is fact and have conducted long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meaning, evolution and pronunciation of 乣 and 乣军. There is also a heated debate about 乣(糺) because the word 乣 is also written as 糺 in the '辽史' – the official Liao History. '乣' did not appear i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until the Liao dynasty – its first appearance is on a memorial tablet inside the tomb of the Northern Emperor (北大王墓志). Liu Feng Zhu (刘凤翥), Yan Wan Zhang (阎王章) and other Chinese scholars argue that '乣' should be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Khitan Large Scrip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Khitan Large Script '乣' is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phonetic development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Khitan Large Script '乣' a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糺', '糾' and others. Its pronunciation can be inferred to be "tiou" or "diu" and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ese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Key Words: Khitan Large Script '乣' pronunciation, Chinese characters, Jurchen Scripts

一. 序言

辽金元三史中有关"乣（糺)"之记事，涉及到金元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是历

* 本文得到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资助(NJSY07003)。

来研究者所重视的问题。由于此问题的复杂性，中外学者对乣和乣军的意义、演变及其读音等问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蔡美彪　1983：1）。由于“乣”字在通行百衲本≪辽史≫又作“糺”，曾引起中外研究者的一番争论，所争论的焦点不外乎以下几点：一、“乣”和“糺”哪一个是正字，哪一个是别字，二、“乣”字是汉字还是契丹字？　三、“乣字”的读音问题。“乣”字不见于辽代以前的汉文文献，于1974年出土的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中首次出现此字后，刘凤翥、阎万章等学者考订为契丹大字（刘凤翥 1979：264－266；阎王章 1989：2)。不过，贾敬颜、杨若薇等学者仍坚持认为汉字“糺”是正字，契丹字中出现的“乣”是汉字纠的简写、俗写（贾敬颜　1980：13－14)。至于乣字的读音更是众说纷纷，难以趋同。因为契丹大字“乣”字也涉及到北方民族语言有些语音发展的规律问题，所以本文仅对此字的读音问题，谈谈我粗浅的看法。笔者首先把以往研究者对此字的主要看法，按所讨论的过程摆出来，然后考察这些不同意见，指出这些不同意见的得失及成立与否，并提出我对这个字的释读意见，以供进一步讨论。

二. “乣（糺)”字的研究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20世纪初开始展开的。日本学者箭内亘（1932）最初在他的≪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一文中曾反复论证乣字为正字，糺字为误字。他的观点得到陈述的赞同，并进一步论证（陈述 1950：377)。王国维则提出相反的看法，说“辽金元三史中的糺字，绝非误字。其或作乣者，乃糺字之省”（王国维 2001b：495)。

日本学者羽田亨最早提出乣为契丹字的意见。[1] 此后，王国维也主张“国维宁信昔人取契丹或女真此字以入汉籍者”（王国维 2001a：492)。后来，藤田丰八（1926)、陈述（1949)、谔士（1960）等研究支持羽田亨的看法。至于“乣”字的读音，箭内亘认为，“≪金史·太祖纪≫之‘萧乣里’，即≪辽史·天祚皇帝纪≫之‘萧敌里’；≪金史·徒单思忠传≫之‘乣椀’即≪温迪罕蒲睹传≫和≪移剌斡传≫之‘迪斡’；≪辽史·天祚皇帝纪≫之‘糺而毕’即≪圣宗纪≫之‘迪离毕’，于是‘乣’字有‘敌’、‘迪’之音”（箭内亘　1933：4－7；27－34)。王国维则提出“其音当读为‘居黝切’，其或与主、竹、敌、迪等字相同用者，乃其讹变之音”（王国维 2001b：495)。又认为“≪元朝秘史≫塔塔儿主因亦儿坚之‘主因’，即‘乣军’之对音（王国维 2001c：482)”。此后他在致藤田博士的信中更进一步解释中说：“乣之音读如‘主’，亦读如‘欧’”（王国维　2001a：491)。此后朱子方和谷霁光也撰文支持王国

1) 转引自箭内亘箭内亘（1932）：≪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49-50，北京：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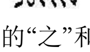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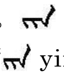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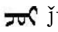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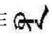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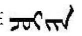
维的看法（朱子方　1946；谷霁光　1948），陈述则主张乣音为“哈剌”（陈述　1949：264）。

1947年，邵循正发表≪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释“札忽惕”一词说：“≪元史·世祖纪≫爪忽都之地,即此。≪元朝秘史≫札忽台、札兀惕忽里、察兀惕忽里等名皆出自此出。窃意此即乣字。乣字应读为札或察”（邵循正1947：79）。蔡美彪、贾敬颜和李桂芝等人赞同邵循正的看法（蔡美彪1983：16；贾敬颜　1980：14；李桂芝　200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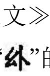
以上提到，1974年，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出土。在此志文的第四、第五行和第二十二行内都有“乣”字，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刘凤翥1983：28）。刘凤翥认为“乣是参照汉字的‘幼’或‘么’而创制的一个读音为‘幼’的契丹大字。就在辽代，这个契丹大字被混入汉字”（刘凤翥　1979：263－267）。此后，阎万章也撰文同意“‘乣’字是契丹字和‘乣’是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字”说法；他还指出“已知‘乣’字是契丹字，‘糺’字是汉字，就不应有正字和误字之分；所谓‘乣’字是‘糺’字之省说是不正确的，‘糺’字乃是契丹字‘乣’的汉译；把汉字的‘糺’字说成‘乣’的别字，是难以令人同意的；谓‘乣’是汉字‘糺’的俗体而被契丹字所借用的主张是不对的”，“乣字读音为gun，是汉语军字之意”（阎万章　1989：2、5、10）。不过，对“乣”字的争论，并未此字在契丹大字墓志中出土而得到解决，一些学者仍坚持认为，汉字“糺”才是正字。1980年，贾敬颜曾发表≪纠军问题刍议≫，补充王国维之说，认为“乣”为“糺”之简字。“乣”的本音是“居黝切”，另有“敌、迪”或“么、咬、遥、瑶、袅”二音。但作为军名，变而有“札、察、抓、主因、主亦”诸读法，也读作“都由切”（贾敬颜　1980：13－14）。1984年，即实曾发表≪从皮室印的解读论说糺军≫一文，以为“乣乃乡字增益而成。……（乡字）改形增笔为乣，而读‘xia’”（即实1984：17）。两年后，杨若薇曾发表≪辽朝“糺”之探讨≫一文，对以往学者们的看法均提出了质疑，认为“糺是契丹语直接借用汉语军，由于遗去韵尾鼻音‘n’而发为‘居黝反’，即糺音的。因此，它的音、义都是军，是军队的通称。乣字不是契丹字或女真字，而是汉字纠的简写、俗写。契丹字中出现的乣是借用了汉字，乣与糺同样读‘居黝反’”，又说≪秘史≫“主因”的拼读正是“军”（杨若薇　1986：105、117）。此外，1992年，香港学者阮廷焯撰写题为≪若干契丹大字之解读≫一文主张，乣字读音为“夭”，“≪北大王墓志≫的‘乣 ’即夭年，夭取少长之义”（阮廷焯1993：524）。

三. 对前人研究的分析

关于契丹大字“乣”的诸看法，如上所述，学界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直

至今日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下面对以上提出的主要看法作一些分析。首先对杨若薇的主张谈一谈我的一些看法。杨若薇所说的那样，在≪辽史・国语解≫中，“某为某名”之解释有许多，其中有一些则是“某为某也”之意。例如，在“虎思窝鲁朵”条下解释：“斡鲁朵，宫帐名”。在“算斡鲁朵”条下则注曰：“斡鲁朵，宫也”。杨若薇就根据这些国语解的记载认为，“宫帐名”乃为“宫也”之意，同样“乣，军名”是可以解释为“乣，是军也”。从而得出“乣的音、义都是军，是军队的通称”的结论（杨若薇1986：104－107）。不过，在≪辽史·国语解≫所谓“某为某名”之解释中，排除其中的意译词语、外族词语后，剩下的契丹语资料中，前一个“某”是契丹语，而后一个“某”是汉语的解释。如，“斡鲁朵，宫帐名”；“夷离堇，统军马大官”；“惕隐，典族属官”等等。最重要的是，在辽以前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乣字，乣字见于辽代契丹文≪北大王墓志≫之中，证明乣字并非汉字，肯定为契丹大字无疑。另外，所谓“主因”是蒙古语对契丹语“乣”的读法，“主因”的拼读正是“军”之说也不对。首先，“主因”一词在≪元朝秘史≫里共出现多次，写作“”（亦邻真：1987）。（yin）字，是蒙古语的附加成份，犹如汉语中的“之”和“的”，“ ǰü”和“ yin”是不能拼读的，所以王国维才说“乣”的读音如“主”，而不是说其读音为“军”，就是这个道理。再者，“军”字，举云切，平，文韵，见；元代读音为[gun]，而不是现代读音jun，韩国语[kun]和日本语[gun]的读音，正好保持了此字的古音。元代畏吾体蒙古文中将“郡、军、君”等写作 [gun]，而不作 [ʤu-in]，正好证明该字的读音。

女真人建国后，依仿契丹大字、小字和汉字，创制了自己民族文字——女真大字和小字。在现存女真文字中确实有许多对照契丹大字所制的文字，所以契丹文字与女真文字的比较来释读契丹文字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过去有些研究者们也曾经试图从女真文字中寻找与契丹大字“乣”相似文字。日本学者藤田丰八（1926）最初提出“汉籍中乣字为女真‘乩’字之传入”。此后，王国维在写给藤田博士信中推测：“顷从≪华夷译语≫女真语中见一‘ ’字，其女真字为，其音为又安，其义为床，以此 字当辽、金、元三史中之乣字，似较乩字为近。此说若中，则乣之音当读如‘又’，此与≪秘史≫以主因对乣军之说合。何则？蒙古语中“ ”母之字，读若英语之J，亦读若Y。…由是言之，则乣之音读如‘主’，亦读如‘欧’”（王国维2001a：492）。

刘凤翥根据≪女真译语≫第二册≪海西建州乣卫都指挥使哈出哈的来文≫（以下简称≪哈出哈的来文≫），谓译文中的“乣”字，是读音为“又”的女真字“”的对译，遂提出“乣”字读音为“又”，可以把“乣”字释为与“又”音相近的“右”、“酉”、“幼”、“优秀”等字，认为≪哈出哈的来文≫中的译文“建州乣卫”即“建州右卫”，

从而把≪北大王墓志≫中第四、五行中的“乣”字释作“酉”，≪辽史·营卫志≫的“边防乣户”，谓即“边防游户”，同书≪百官志≫中的“遥辇乣详稳、遥辇乣都监、遥辇乣将军、遥辇乣小将军”的“乣”字，认为都可训为“右”，并说“乣军”即“游军”，也即骑兵之意（刘凤翥 1979：265－266）。对此阎万章作了较详细的评论，他认为，“建州乣卫”的“乣”字不写作“右”，这很可能是≪哈出哈的来文≫的译者的误书，或者是后人传抄之讹”。他还批驳了刘凤翥文章中所考释的契丹大字年号、干支和个位数字方面的一些失误，指出契丹大字“乣”字的读音根本就不读作“又”（阎万章 1989：8－10）。从字形上看，女真字“ ”与“乣”字有些相似，不过这只是推测而已，没有明确的根据。[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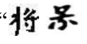
除了乣字的读音以外，我基本赞同阎万章对此字的看法。不过，他所提出的乣字读音为“gun”的说法，仍缺乏说服力。辽宁省北票县莲花山辽墓出土的汉文≪耶律仁先墓志铭≫记载：“王讳仁先，字一得，姓耶律氏，……兴宗皇帝亲宣制曰：‘唐室之玄龄、如晦，忠节仪同，我朝之信你、空宁，壮猷宜比’”（向南 1995：352）。[3] 又据≪辽史≫传83，≪耶律休哥传≫云：“耶律休哥，字逊宁”。同书卷96，≪耶律仁先传≫云：“耶律仁先，字糺邻，小字查剌……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后，惟仁先一人而已”。≪墓志≫中所说的“我朝之信你、空宁”，即辽朝的耶律休哥和耶律仁先。阎万章根据以上汉文墓志记载认为，“‘信你’即‘逊宁’的异译，而‘空宁’就是‘糺邻’异译。汉语中的‘军’字，在日本语和朝鲜语中，都读作gun，而与契丹字‘乣’读音为“空”的声音相近，可知‘乣’字必为汉语‘军’字读音无疑”（阎万章 198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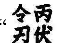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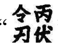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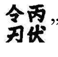
至于“空宁”这个名字，刘浦江在最近发表的≪“糺邻王”与“阿保谨”≫一文中主张：“陈述先生≪全辽文≫卷八据抄本转录，误作“室宁”，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则作‘空宁’，比对墓志拓本，发现前一字确实很像‘空’字，但因此字上部有一划痕，究竟是否‘空’字尚有疑问。既然我们确信这个名字是耶律仁先的第二名糺邻的异译，那么译作‘空宁’肯定是不对的。经仔细辨识拓本，我们认为这个名字应该是‘竺宁’，‘竺宁’与‘糺邻’的译音可以相同，而且与王国维提出的乣（糺）音主、竹的推论可谓不谋而合”（刘浦江 2006：8）。

我认为刘浦江的解释较有说服力的，对此我稍加补充一下。“竺”这个字的古音有二，一是：“张六切，入，屋韵，知”。二是，“冬毒切，入，沃韵，端”（辞源 1979：1274）。“竺”字之“冬毒切”与下面要讲的契丹小字“”（糺邻）二字的前两个字的读音很接近。所以，也不能简单地把“空宁”看作“糺邻”的异译。“宁”

2) 金启孮推定女真字“”是由汉字“幼”字变笔制成（金启孮1984：87）。
3) 本志文所在辽兴宗制书中“唐室之玄龄、如晦”，即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

字和“邻”字，只有n、l辅音的差别，这在当时的汉语方言中是可通的。

≪辽史·百官志≫“北（南）院详稳司”、“近侍详稳司”和“宿卫直司”下设“详稳、都监、将军、小将军”等官（辽史1974：691、693、698、701）。契丹大字的“(将军)”一词见于≪耶律延宁墓志≫，已为刘凤翥、于宝林先生释出（刘凤翥、于宝林 1984：80－81）。丰田五郎将这两字读音构拟为sianggün（丰田五郎 1995：12）。[4] 所以，在契丹语中，军字读音仍然是*gün，阎万章所主张的“乣”字读音为“军”的观点也难以成立的。

我们知道，契丹大字和小字都是记录契丹语的，同一个单词无论是用契丹大字或小字来记录，读音都是相同的。当然，契丹小字记录契丹语，比起契丹大字表达得更准确。如果在契丹小字现存资料中能够找到与契丹大字“乣”相同的词的话，对这一字读音问题解决就容易得多了。在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中“”一词出现了很多次，是墓主名称。即实（巴图）认为“”就是仁先之字（即第二名）“糺邻”的契丹语拼法，契丹字当读为tiouərnə（即实 1996：202）。即实的这一解读结论得到了清格尔泰、吴英哲、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等学者的支持。[5] 清格尔泰把这四个字的释读为tiouren，即≪辽史≫所记载的“纠邻”，并且进一步解释说：“ti变为ji是蒙古语族语言中可以见到的现象。如古代蒙古语的ti、di在现代蒙古语变为ji、ci。在一般蒙古语里的ti、di在东乡语里变为ʨi、ʥi等”（清格尔泰 2002：53）。总之，“”一词就是“糺邻”的对音，这与箭内 亘提到的“乣’字有‘敌’、‘迪’之音”的看法不谋而合。

契丹语和蒙古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古老的语言—东胡人后裔的语言集团。≪北史·室韦传≫说，契丹语与室韦语相同（北史，页3129）。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语言都经历过多次的分化、融合过程，但从历史文献中仍然找到契丹语与蒙古语互通的部分。≪辽史·国语解≫中收录不少契丹语基本词汇，如，契丹人把“河”叫作“没里”（*mor），“兔”叫作“陶里”（*taula），“五”叫作“讨”（*taw），“百”叫作“爪”（*zhaw）。这些词都与蒙古语互通（辽史，页1523）。更重要的是，契丹语的所有格附加成分-an，-en，-in，-yin，-un与蒙古语的-yin，-un~ün，-u~ü有同一个起源（清格尔泰等 1985：136-138）。≪元史·太祖纪≫载：十二年丁丑“秋八月，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将蒙古、乣、汉诸军南征”（元史，页19）。这是蒙元文献中有关乣军的最早的记录，而成书于蒙古太宗时期（1229-1241）的宋朝的彭大雅撰徐霆疏≪黑鞑事略≫的一条史料，是记录蒙古早期的军队组织：“五十骑谓之一糺”，原注云：“都由切，即一对之谓”（彭大

---

4) 聂鸿音（1999）将这两个契丹构拟为sianggun或siangin。

5) 清格尔泰(2002：53, 45)；吴英哲(2002: 50)；爱新觉罗・乌拉熙春(2003: 15)。

雅1976：501）。若按彭大雅纠（糺）字“都由切*tǐəu”的说法，与契丹小字“ ”一词的前两个原字的拟音非常接近，即*tiou，这也成为一个佐证。直到明代为止，在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的女真语中，前高元音前的舌尖音d、t的鄂化尚没有完成，在清初的满洲语里才发生了di>ǰi、ti>či的音变（道尔吉、和希格1983：240）。看来，在蒙古语族语言中，这个变化就似乎很早就发生了。

阎万章还提出“≪元朝秘史≫所记乣军之音，乃是契丹字‘乣’字译为汉字‘糺’的音读，并非‘乣’的音读”的观点（阎万章　1989：7）。不过，问题是蒙古人有没有直接从汉语借用的可能性呢？我们知道，辽王朝对蒙古高原进行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辽朝的统治中心在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地区，其疆域南边只包括燕云十六州等部分领土，而其北境则把蒙古高原大半部纳入了版图。契丹人属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有着浓厚的游牧特点，因此，辽对蒙古高原的统治十分重视，统辖蒙古高原的西北路招讨司在辽朝的边防机构中地位最重要（陈得芝　2005：26－37）。辽代契丹所称的乣，主要是北方边境俘降的各族分子，不包括汉人和渤海（蔡美彪1983：22）。辽朝统治时期，蒙古人直接借用汉语的可能性甚小，一般是通过突厥人和契丹人借用汉语的，如：“详稳（<将军）”、“敞史（<长史）”等。

金代塔塔儿人的牧地在贝尔湖周围，离金朝较近，因此他们与金朝交往的机会就更多。在金章宗明昌年间以前，塔塔儿部一直受金朝控制。≪金史≫称塔塔儿部为“属部”，≪元朝秘史≫第五十三节称他们为“塔塔儿主因亦儿坚”。对此王国维考证说：“此‘主因’即为‘乣’，‘主因亦儿坚’意即乣民”,这就是说，塔塔儿部是金朝乣（王国维　2001c：479－491）。落入明人手中的≪秘史≫的畏吾体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不过，移录≪元朝秘史≫的大约三分之二的罗藏丹津（Blo bsang bstan gjin）≪简述古昔诸汗礼制诸作黄金史≫中“主因亦儿坚”的记载凡三见：第10页：“Tatar irgen ǰui-in irgen Qiyad Ambaqai qaγan-i bariǰu Qitad-in Altan qaγan-tur abču odqui-tur”。又第110页和第111：“Qara qitad-un ǰürčid-ün ǰ（y）ui-in irgen”（Blo bsang bstan gjin 1990）。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记写的字型为“ᠢ”。我们知道，蒙古文的原字符号“ᠢ”（I）除了记写元音[i]外，还记写半元音[j]和塞擦音[ʤ]，所以，总要引起一些混乱，混淆[j]和[ʤ]。罗藏丹津移录≪秘史≫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元朝秘史≫“主因亦儿坚”一词的“主”音更接近“乣”字的读音，而不是“札兀惕”的“札”。辽金以来，乣已成为世代沿用的专有名词，为蒙古所继承。蔡美彪认为：“蒙古所称的乣，初期称谓汉人、契丹及女真，后来更为广泛地统称被征服地各族人，包括汉人、契丹、渤海、女真以及高丽、唐兀等其他各族分子。但随着领域的扩大和各族人的增多，

乣的译名逐渐缩小，限于南人以外的汉族以及汉族杂居的非色目的各族人。汉文文献中乣的译名也由乣汉演为'汉儿'或'汉人'"（蔡美彪1983：17、22）。所以，阎万章所提出的"≪元朝秘史≫所记乣军之音，乃是契丹字'乣'字译为汉字'糺'的音读，并非'乣'的音读"的观点也难以成立。

四. 结语

契丹大字与汉字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正如≪契丹小字研究≫中指出的："汉字是契丹大字造字的直接之'源'。契丹大字借用汉字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有的直接借用汉字的形、音、义；有的借用汉字的形和义；有的借用汉字的字形",不过,"大部分契丹大字的字形虽与汉字不同，但也是改造汉字而成"（清格尔泰等1985：5）。另一方面，由于建国以前或建国后，契丹人除了汉人外，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突厥、回鹘、女真、蒙古等民族长期接触（即统治或被统治），他们的语言之间必然有相互借贷的情况。所以解读契丹文字时，应该特别注意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虽然大部分契丹大字是改造汉字而成的，但不一定都采用汉字的音。契丹大字"乣"的情况就属于这种情况，"乣"字可能是参照汉字的"糺"、"糾"、"幼"字或其它某一汉字而创制的，其读音可以构拟*tiou或*diu。在辽代，这个字传入汉字当中。

（本文承蒙清格尔泰、宝音德力根两位教授审阅并予以指正，谨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王国维（2001a），＜致藤田博士书一＞，≪观堂集林≫（下）16：491-494，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国维（2001b），＜致藤田博士书二＞，≪观堂集林≫（下）16：494-495，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国维（2001c），＜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观堂集林≫ 16：479-49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彭大雅（1976），＜黑鞑事略＞，≪蒙古史料四种≫：465-528，台北：正中书局。

藤田丰八（1926），＜问题二则＞，≪史学杂志≫ 37.9：120-128，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会。

羽田亨（1916），＜读"再论辽金时代的乣军"＞，≪史学杂志≫ 27.1：135-150，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会。

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译（1932），≪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子方（1946），＜辽金乣军考略＞，≪东方杂志≫ 42.11：35-52，商务印书馆。
邵循正（1947），＜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 14.1：71-118，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
谷霁光（1948），＜辽金糺军史料试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5：387-40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陈述（1949），＜乣军考释初稿＞，≪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 251-300，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陈述（1950），＜乣军史实论证＞，≪史学集刊≫ 6：377－388，吉林大学。
谔士（1960），＜跋黑龙江泰来县塔子城出土的辽大安残刻＞，≪考古≫ 8：39-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李延寿撰（1974），≪北史≫，北京：中华书局。
脱脱等撰（1974），≪辽史≫，北京：中华书局。
刘凤翥（1979），＜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乣”的读音＞，≪民族语文≫ 4：263-26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刘凤翥（1983），＜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文物≫ 9：23-29，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编辑委员会。
≪辞源≫（1979），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贾敬颜（1980），＜纠军问题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6-15，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期刊社。
蔡美彪（1983），＜乣与乣军之演变＞，≪元史论丛≫ 2：1-22，中国元史研究会。
道尔吉、和希格（1983），≪女真译语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学报增刊。
金启孮编著（1984），≪女真文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
刘凤翥、于宝林（1984），＜“耶律延宁墓志”的契丹大字释读举例＞，≪文物≫ 5：80-22，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编辑委员会。
即实（1984），＜从皮室印的解读论说糺军＞，≪黑龙江文物丛刊≫ 2：15-22，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部。
清格尔泰等（1985），≪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若薇（1986），＜辽朝“糺”之探索＞，≪历史研究≫ 1：100-117，中国社会科学院。
亦邻真（1987），≪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阎万章（1989），＜论辽金元史中的“乣”与“糺”＞，≪辽金史论集≫ 4：1-15，书目文献出版社。
阮廷焯（1993），＜若干契丹大字之解读＞，≪第三十五届阿尔泰学会会议论文集≫：521-527，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
丰田五郎（1995），＜契丹大学的解读线索＞（肖爱民译），≪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60-361，北京：文史出版社。
向南（1995），≪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即实（1996），≪谜林问经——契丹小字解读新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聂鸿音（1999），＜契丹大字解读浅议＞，≪民族语文≫ 4：51-8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清格尔泰（2002），≪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吴英哲（2002），＜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补释＞，≪内蒙古大学学报≫ 5：49-54，内蒙古大学学报学报编辑部。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2003），＜“耶律仁先墓志”与“耶律智先墓志铭”之比较研究＞，≪立命馆文学≫ 581：15-17，立命館研究所。

陈得芝（2005），＜辽代西北路招讨司＞，≪蒙元史研究丛稿≫：25-38，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浦江（2006），＜“乣邻王”与“阿保谨”＞，≪文史≫ 4：1-13，中华书局编辑部。

李桂芝（2007），＜辽朝乣军管见＞，≪宋辽金元史≫（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3：40-4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Blo bsang bstan gjin (1990), *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u jokiyal-i Tobčilan Quriyagsan Altan tobči kemekü orošibai*, Ulaganbagatur : Ulus-in Heblel-un Gajar.

ERDENIBAGATUR Borjigidai
School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bbaatur@hanmail.net>

Received 30 March 2008;
accepted 29 May 2008.